

文史集萃 目 录

一九八三年
第一辑
(总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我所感受的团结周谷城 (1)

血溅金陵忆当年雷洁琼 (8)

——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

附：“中统”特务如何制造南京下关事件……张 文 (46)

重庆《新华日报》胜利撤退延安始末于 刚 (53)

“少年中国学会”的几次年会舒新城 (70)

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

.....刘清扬 (86)

吴化文将军起义记王一民口述 魏予珍整理 (110)

记武汉金口起义张 轸 (118)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张锡祚	(135)
经学大师、革命战士吴承仕	鲍弘道	(163)
科举考试的回忆	商衍鎏	(171)
清末民间儿童读物	张秀熟	(188)
百年名剪张小泉	张祖盈 许子耕	(199)
从“蛇叫化”到研究员	季德胜口述 祖丁远整理	(211)

· 补白 ·

一字褒贬 其妙无穷	诸葛容	(52)
状元公当了农事试验场长	何 集	(85)
张伯苓协助范文澜避难	梁 杨	(134)
马叙伦掩护过陈独秀、李大钊	镜 澄	(162)

我所感受的团结

周谷城

早在大革命时期，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我在广州、衡阳、长沙、武汉等地，常常看到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初，我有一位老同学徐鸣鸿同陈铭枢到了长沙，我到 he 住的地方去拜访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同陈先生来与唐生智商量北伐的事。”我知道这就是国共合作的工作。不久，徐同陈铭枢要从湘南回广州，我听说广州的形势很好，想去看看，徐便约了我同去。到达广州后，住在粤秀路粤秀酒家。当时毛主席正兼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听说我来了，曾两次到粤秀酒家来看我，并留我在广州教书，也就是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些工作。可惜我没有同意，就回长沙。这时北伐军正向湖南前进。我路过衡阳，住了几天，曾晤到几位在北伐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的学生，使我知道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情况。在长沙时，与何叔衡、夏曦等常见面，比较谈得来，每次见到，他们总鼓励我要我多作事，也就是多做革命工作。

至于毛主席，因为和我在第一师范同过事，彼此相知较深，曾鼓励我读《资本论》，并以康民尼斯特小丛书（就是共产主义者小册子）给我看。我受了影响，曾在长沙参加省农民协会为顾

问，参加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讲师，参加船山学社为教师，都是与他的团结工作分不开的。为着统一办报的工作，他曾请我吃饭，此后我在报上也发表过两篇论租谷的文章。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毛主席曾鼓励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这是两篇租谷论后一篇较长的文章，本是我替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写的讲稿。到武汉时，我拿给毛主席看。他看了之后，对我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功夫的，最好在报上发表。后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一星期，影响颇好。邓演达先生看了很感兴趣。他要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去做地下工作，即嘱我去任秘书，并说我对农民运动有研究，能去最好。当时我以身体弱，痔疾亦很重，婉言谢却了。毛主席见我既不去战区农委，就叫我到他自己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我在全国农民协会做宣传工作，与夏明翰很谈得来。夏当时是会里的秘书长，年纪比我小得多，又是湖南人，总把我当同乡前辈看待。我们谈起农民运动的道理来，越谈越有趣，有次他要介绍我同鲍罗廷去谈，我婉言谢却。除夏明翰之外，在武汉也常见到另一位姓夏的，即夏曦。他也是湖南人，而且是我的小同乡，益阳人。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他正在读书，也上过我的课，他是一个最能团结师友的人，我在武汉就感到他善于团结人。四一二事变之后，宁汉分裂之前，他曾约我在汉口一家旅馆里作竟夕谈。我与他同住一个旅馆的同一房间，算是仅有的一次。所谈问题很广泛，上天下地无所不谈，归结起来，不外是中国的革命问题。所可痛惜的是，这次竟夕谈之后，就此永别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凡十八年中，我除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在上海译书卖文过日子

外，全部时间都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书。在教学期间，我也常同学生一起参加一些反帝爱国的斗争，并经常得到进步学生、进步教师的支持和帮助。当我遭到打击和压迫之时，他们几乎成了我的恩人，他们大多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我很早就感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照顾和团结。除此之外，毛主席同我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中断了的，抗战前夕，他曾有信给我，号召团结抗日。当时我住在上海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有一天忽然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打开一看，其中有用复写纸写的、毛主席寄给我的信。信中提及的还有两位军政要人：一位是李烈钧，是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时的江西都督；另一位则是大革命时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提到的知识分子还有方克刚、舒新城、李达、顾颉刚、周予同等。我接到这信，除对李达讲过之外，没有对信中提到的其他任何人提起过，因为不知底细，不敢冒昧提起。李达的思想，我知道较详，故敢对他直说，并同他商量了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等。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经过八年之后，日本侵略者毕竟被击败了。一九四五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从延安到了重庆，当时我也在重庆。有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要举行茶会欢迎毛主席，我知道这个消息，便同该会秘书长张西曼商量，如何可以同毛主席谈谈。张说，您早点来，在会场外迎接着就行了。我照着张西曼讲的做法，在开会前不久，站在会场外等候，果然看到毛主席身穿蓝布短装，头戴白色邮帽，手执卫生小棍，向会场大门走来。我迎上去握了他的手，一言未发，因为心里有些激动。毛主席大声问道：“您是周谷城先生吗？”我答：“是的。”毛主席随即以手

作势说：“一十八年了！”意即从一九二七年离开武汉，到这次重庆会面，共分别了十八年。这时他眼里含着泪珠，我也流了眼泪。我问他过去的病好了没有，他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这次仓卒见面之后，隔了几天，徐冰同志又约我到张治中住宅同毛主席见面，同去的还有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及郭沫若先生的夫人于立群等多人。凡此等等，足见主席念旧情深，团结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之情，也很殷切。

我是一九四一年由上海去重庆的。在重庆晤到了阔别十八年的老友，心情有些激动。这次由上海到重庆，以及在重庆小住几年，亲身感受到的团结，今日回忆起来，也都是令人心情激动的。一九四〇年冬，我离开上海之前，我爱人的母亲张育民和她的丈夫卢志英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常常帮助一些青年去苏北。他们熟悉上海情况，知我处境危险，竭力劝我赶快离开上海，并帮助我奔赴内地。他们在危险区里工作，却帮助我们向内地奔，其热情实在令人感动。到了重庆之后，徐冰同志约我在章伯钧家中吃饭，畅谈沦陷区情形，并对我历经辛苦由沦陷区跑到内地，再三慰勉说：“辛苦了！辛苦了！”使我感到很大的温暖。在重庆时，有次在马路上遇到陈家康同志，他高兴极了，随即约我到莫斯科餐厅吃饭，他对我说：“恩来先生知道您来了，很想同您谈一谈。”我说：“今天天色已晚，来不及了，改天我同你一道去见他。”可惜的是，在重庆，我一直未能见到他，因为我住北碚复旦大学，离重庆市有很长一段汽车路，有时恩来同志通知参加市区的一些座谈会，竟没有一次能如期到达。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正

讨论要复员回上海时，吴玉章、王维舟两位同志请我到一家酒店吃饭，在座的人，现在记得的有武汉大学教授杨人楩及章伯钧。我们谈了复员的问题，也谈了民主问题。饭后我还写了几句短短的谈民主问题的话，交《新华日报》发表。

一九四六年由重庆回到上海，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我同进步青年和教师一起，进行了一些反帝爱国斗争。曾同潘震亚、张志让、沈体兰等组织秘密的大学教授联谊会，会中有党员同志领导，我常被推荐为中小学教师及大学生作一些反帝爱国斗争的报告。有一个时期，我曾受到警告，不要向学生作报告，我不理睬，仍同寻常一样，参加座谈会或在报上发表反帝爱国的言论。青年学生对我保护得十分周到，令人感动。离解放不久前，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认为我同陈望道、潘震亚等深得青年们的爱戴，曾在昆山路一座房子里，指定我们三人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我们没有辜负使命，解放后不久，陈毅同志即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我为常务委员兼教务长。解放前一月，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曾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捕去，由学校当局负责保释出来，并具结保证随传随到。此后一个月内，精神十分紧张，幸喜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完全解放。几天之后，陈毅同志召集各界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开座谈会，与会有好几百人。会议主席请吴有训和陈望道相继发言之后，叫我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被解放”的意义，陈毅同志立即插话说：“不是被解放，而是会师。”即是说我们从里面打出去，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彼此会合之意。这话对知识分子所作的反帝爱国斗争评价很高，团结的作用很大，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我被安排在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内。这一组共十二人，即郭沫若、李达、董鲁安、王之相、张奚若、丁燮林、吴有训、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和我。现在这十二人只剩下我一人了。自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到北京的机会多起来了，到中南海同毛主席谈话聆教的机会也不少。我到中南海谈天，主席有时留我吃饭。有一次两人游泳至天黑，即在露天游泳池旁边的布棚下吃饭。有一次吃饭，除我同主席两人外，有江青参加，当时江青很少出来见人，这次除在吃饭桌旁，对我说了一声“请坐”以外，几乎没有说过第二句话。有一次主席用长途电话要上海市委用飞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谈至深夜，同陆定一等几个人吃了一餐晚饭。最有意义的一次，大概是在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主席竟以请客的方式约我到中南海。我于上午九时到达，主席即问我在北京的学术界有哪些人谈得来，我说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王方名、胡绳等。他随即叫工作人员把这些人找来。吃饭时，他对这些同志说：“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当时我看主席兴致很好，只好不赞一词，没有说不敢当。饭后谈至三时许才散。这一次吃饭谈天，充分说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关怀团结之至诚，十分令人感动。令人感动的事还很多，这里再举在杭州西湖刘庄吃饭的一事为例。约在一九五八年冬的一个晚上，主席曾以自己的飞机把我同赵超构、谈家桢三人接到杭州，我们随即由机场乘汽车到刘庄，主席披着大衣出门来迎接我们，很幽默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的睡觉吧？”我们齐声说：“没有，没有。”进门后，四个人即围着一张方桌坐下谈天，中外古今，无

所不谈。直至深夜十二时以后，就在旁边的桌上吃便饭，饭后又谈，几乎快天亮了，我们告辞出门。这时主席送我们到汽车旁，我们都说：“主席请转！”主席说：“你们先上车。”我们都说：“主席不转去，我们怎好上车。”主席却说：“你们不上车，我就不转去。”诚挚动人的话，令我们永远难忘。差不多快天亮了，我们到旅馆睡下，直到上午约八时以后，我们还未起来，主席又在外边叫我们说：“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华同志要请你们吃饭。”我们觉得却之不恭，只好赶快准备，去参加江华同志的宴会，赴宴会的有盛华同志及浙江省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江华同志举杯祝酒之后不久，赵超构同志忽然举杯起立，说要借花献佛，用主人的酒祝大家健康，言下似乎有要作自我批评之势，主席立刻制止曰：“不许可，不许可！”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这正与我在上海的一次经过相似。那一次主席指着我对许建国副市长说：“这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说：“是、是。”我深感不安，插一句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主席听了，大声制止说：“没有人怪你！”这些至诚感人的话，令人永远难忘。我所感受的团结决不止这点点滴滴，现在就写出这点点滴滴，以见一斑。

（原载上海《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一九八二年第一辑）

血 溅 金 陵 忆 当 年

——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

雷 洁 琼

历史的背景——走出象牙塔——组成请愿团——在北火车站——途中的斗争——下关的暴行——被打伤之后——全国轰动了——会见蒋、马、宋——由南京返沪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和南京，是一个寻常的、晴朗的夏日，但是，在我迄今为止的七十七年的生活中，却是一个难以忘怀、激动人心的日子。这一天，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阴影笼罩下，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市人民团体代表团（共九个代表，当天成行的有八个代表，另有学生代表二人），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和平。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上海北火车站，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一起，隆重欢送代表团赴京请愿，使我深受感动。当天我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阻挠和毒打，我也被打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晚，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亲自赶到医院慰问我们；不久，毛泽东、朱德同志又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全国

人民的同情都投向我们，全国的进步舆论都声援我们。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齐跳动。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但是，许多当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就象“过电影”一样。今天，参加请愿的九位代表中，马叙伦、黄延芳、包达三、张纲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七位同志已经作古，幸存者只有胡厥文同志和我。胡老已经九十岁出头，而且他因事当天未能成行，没有碰上“下关事件”，因此，我这个相对来讲的“年轻人”、事件全过程的参加者，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一段史料回忆、整理出来，并就教于各位知情的同志。

历史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急急忙忙跑下峨眉山，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大搞反革命两手：一面玩弄和谈阴谋，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一面依仗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支持，调兵遣将，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吞掉。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一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人民运动。两股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搏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上通过了决议，发布了停战令。但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集团就悍然调动了上百万的大军向解放区进攻。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眼看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到这年

的六月，蒋介石集团由于在军事上连遭挫折，需要喘息时间作全面准备，部署新的进攻，于是又提出自六月六日起，在东北战场上停战十五天。到六月二十一日，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又宣布将东北停战令延期八天，到六月三十日为止。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制止内战危机，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谈。美国政府则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调解”。

这次停战和谈，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民十分关心。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方面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打算，一方面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六月上旬，先由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要求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与此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函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反对内战。全文如下：

夷初、行知诸先生大鉴：

顷奉惠函，并承示上蒋主席书。维诵回环，弥觉辞危而情苦，感人至深，曷胜敬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依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唯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才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姑不问国

民党当局于此诚意若何，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义。时迫事急，临颖不尽。除遵嘱将函转陈毛泽东同志外，专此肃复。 顺致

时绥

周恩来 董必武 陆定一 邓颖超敬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地下党决定酝酿组织一个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战争的狰狞面目，在政治上给敌人一个打击，以配合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和谈斗争。

走出象牙塔

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能参加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亲身受到“下关事件”的战斗洗礼，主要是受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驱动，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

一九三一年，我二十六岁时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我学的是社会学。我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可是学成回国后，我不禁为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感到震惊。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呢？我接受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聘任从事教学工作，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但我眼看着不合理的社会却束手无策。回国后仅仅两个星

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蒋介石集团采取不抵抗主义，使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得寸进尺，第二年又进攻我国驻在淞沪的十九路军，爆发了一二八抗战。日军入侵，国土沦丧，同胞被杀，全国人民无不热血沸腾，怒火满腔。我和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马鉴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棉手套，送往东北，送往古北口，送往上海十九路军。但是，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去“围剿”红军，忙于打内战，而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我国的东北三省、热河（现河北北部）和河北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驻扎着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欺压、奴役中国人民。而蒋介石政府却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发布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不许人民爱国。我们气愤之极，感到要做亡国奴的危险，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我愤怒、迷惘、困惑的时候，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朝气感染了我，激励了我，把我卷入了群众游行的队伍。我走在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从海淀经西直门走到西便门，亲眼看到学生们用大木头撞开城门，看到学生们冲破全副武装军警的防线胜利前进。我佩服学生的勇敢爱国行动，我将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爱国青年。后来，我从爱国青年中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起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内心十分敬佩。我开始认识中共是爱国抗日

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歪曲宣传，我尚不了解中共的组织 and 目标。

一九三八年初，我毅然离开燕京大学的教学岗位，走出了象牙之塔，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主要是组织和训练妇女参加抗战。在江西时，我同许多爱国青年合作共事，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我能看到进步的书报杂志。我的视野开阔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在这同时，我还接触到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给了我许多教益。记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庐山全国妇女座谈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在会上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使我非常钦佩。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我和办事处主任陈少敏时有来往，得到她不少帮助。我在南昌某女子中学里还听过一次陈毅同志作的关于游击战的报告，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敬仰不已。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到前方视察，路过吉安，我幸蒙接见。记得他谈到了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的道理，透彻地分析了形势，得出了抗战必胜的结论，使我心明眼亮。我认识到中共真正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这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再加上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更增加了我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后来，由于政治形势不容许我在江西继续工作，我转到沦陷区的上海教书。敌人的凶残，汉奸的无耻，人民的苦难，亡国的危险，使我忧心如焚。这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组织了两个“聚餐会”：一个是“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文化界人士；一个是“星五聚餐会”，参加者多为工商界人士。“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萧老板家中

举行，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费。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有陈已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我和我的爱人严景耀也是这个聚餐会的经常参加者。这个聚餐会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外围的进步政治组织。通过这个聚餐会，我们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我和党的关系密切了。

组 成 请 愿 团

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发展。那时，旧政协将要召开，国共两党将要进行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要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昆二聚餐会”的人员为基础，由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已生、梅达君、谢仁冰（章汉夫的父亲）、张纪元、柯灵、严景耀、雷洁琼等二十六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四六年五月，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力量，进一步开展反独裁、反内战、反美帝的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棉纺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各界四十七个主要人民团体（以后又发展到六十八个）联合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各界群众四十万人。第一届理事共二十九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已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当选为理事。代表其他方面当选理事的还有沙千里、闵刚侯、沈肃文、

沈志远、胡厥文、孙晓村、罗叔章、盛康年、胡子婴、汤桂芬、韩武成、秦柳方、甘田、蒋学杰、叶克平、王本鸣、李传庆、彭文应、赵家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将向有关各方呼吁停止内战，并请美国政府莫再以军火资助任何一方，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还决定反对上海市警察局实行法西斯的“警管区制”。然而，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竟然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六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并推举九人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

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上海八仙桥一家饭店吃饭并开会，共到十余人。除胡厥文外，参加代表团的人员都到了。马老（叙伦）在会上宣布：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黄延芳、包达三、张纲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雷洁琼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陈已生之子），共十一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马叙伦被推为代表团团长。罗叔章、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罗作为先遣人员已在南京筹备。大家还一致推举吴耀宗写英文备忘录，以便面交马歇尔。会上还商定了请愿的策略：代表团到南京后要向国、共、美三方提出要求和平，当然，斗争的锋芒是指向蒋介石集团的。

代表团名单及身份如下：

马叙伦 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厥文 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